

二十年来,北京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来这里淘金,加上中国人的老乡情结,于是形成了一些外地人的“城中村”。比如“浙江村”、“福建村”、“新疆村”等等。外地人影响了北京的生活方式,北京也接纳并改变了外地人的思想。正是因为这些外地人的大批迁徙和融入,北京才变得更加多元,更加包容。

## 北京城里外地人的“城中村”

二十年来,北京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来这里淘金,加上中国人的老乡情结,于是就形成来自同一个地区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城中村”。比如北京的“浙江村”、“福建村”、“新疆村”等等。

**浙江村:**  
**最有活力的“城中村”**  
张景富的小餐馆在木樨园天雅服装大厦后面的一条小巷子里,巷子虽小,人却出奇的多,到处是肩背手提各色塑料货袋或蹬着三轮车装卸货物的人。

北京木樨园、大红门服装商业街,年交易额300亿元人民币以上,占据了北京服装业交易额的54.5%。张景富的小餐馆占了地利之便,生意非常好。

“浙江村”的范围主要在丰台区南苑乡的时村、果园村一带。

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这里的房租非常便宜,距离越公家长途汽车站,北京南站也比较近。

以浙江温州人为主的

来京务工人员看中了这里的地理位置,陆续在这摆地摊做起了服装生意。  
林立昌是最早一批来北京的浙江人,1985年他来这里时,整天背着一个大包,东躲西藏地摆地摊,两年下来也没挣到什么钱。  
林立昌的命运转折在于抓住了一次机会,而他的经历也是“浙江村”形成的原因。

1988年,他靠倒卖皮夹克挣了一笔钱,于是他干脆在附近租了一间面积仅30平方米的房子,自己办了一个加工厂,白天摆满缝纫机等工具,晚上就睡在地板上。

“白天干活,晚上睡地”是很多浙江人的发家经历。

那些年来克非非常火,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甚至许多外国人都直接来这里采购,林立昌经常几天不睡觉连续赶活。

后来自己实在做不过来,就找来了家里的亲戚,亲戚又带来了老乡,老乡又带来了自己的亲戚。

于是,在这里的浙江人就越来越多了,“浙江村”就是这样形成了。

“浙江村”逐步摆脱了那种低级的经营模式,林立昌也苦尽甘来,不仅有一个小型服装加工厂,在天雅、

京园、龙秋等批发市场还拥有七个摊位,资产过百万。

从“浙江村”走出来的一大批富翁,在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后,开始涉足更多的行业。房地产开发、文化传播、矿山开采以及互联网等高科技行业几乎都有浙江人的身影。

**福建村:**  
**以建材生意为主业**

在京郊立水桥以北1公里的范围内,沿公路分布着以福建人为主,经营木材、铝合金建材等大大小小的建材贸易公司,这里就是“福建村”。

“福建村”的兴起得益于1980年以来北京北郊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

立水桥方圆十几公里的范围内新建的花园、别墅、公寓以及奥运村的建设,为建材贸易提供了很大的市场。福建建材商看好了这个机会,便纷纷在立水桥附近开起了公司。

福建人也是中国有名的一大商帮,福建泉州、晋江、石狮的服装鞋帽遍及全国,沙县人开小吃部,安溪人卖铁观音,莆田人除了做服装生意,还很善于经营医院。据说,全国80%的私立医院的幕后老板都是福建莆田人。

**新疆村:**  
**曾经扎堆开餐馆**

新疆村早在1970年代末就开始形成,分为两片,一片在甘家口,一片在魏公村,多以开饭馆为主业。

最初,在魏公村地区的几条街边上,由于有很多新疆人开的餐厅,附近居民的出租房大都出租给了这些新疆人,形成了“新疆村”。

但是由于拆迁和旧城改造的原因,新疆村消失了,但要在北京找一家新疆餐馆还是很容易。

“新疆村”起源于甘家口附近的西苑饭店。

西苑饭店始建于1950年,当时叫西苑旅社,是作为团结穆斯林民族的窗口建设的。从1950年代开始,国家陆续从新疆招了一批厨师进京。新疆厨师们又慢慢地带来了他们的家属和老乡,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方面的原因,他们大多居住在同一区域,并多以开餐馆为业。

外地人影响了北京的生活方式,北京也接纳并改变了外地人的思想。正是因为这些外地人的大批迁徙和融入,北京才变得更加多元,更加包容。

摘自《小康》

## 就让对手捅到你的软肋

跑。这样猎豹就不能发挥它快速奔跑的特长,羚羊也就能安然逃生了。

如果没有羚羊,猎豹怎么会知道自己最为擅长的奔跑其实也有弱点?这就是自然界的军备竞赛:如果捕食者的速度快,那么被捕食者必须跑得更快。如果不能跑得更

快,那就要凭借耐力或计谋逃脱。否则有些物种就会灭绝,食物链上的其他物种也会有生存危机。所以大自然这个造物主,不会轻易地使一个物种灭绝,而是让每一个物种之间相克又相生。

我们与竞争对手的关系也是一样。当对手绞

尽脑汁地思考着如何赢得顾客时,我们便知道自己自己的工作该如何做;当对手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战胜我们,我们就必须不断进步;当对手毫不留情地指出并利用我们的缺点加以进攻,我们就必须完善自我。当有一天我们开始衰败的时候,可能才发现:那是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自己致命的软肋!  
摘自《感恩的心》

## 北斗星与GPS的较量

位系统。其次还有俄罗斯的GLONASS卫星导航系统,以及欧盟的伽利略计划。现在,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成为又一个不愿意让GPS继续成为“卫星导航系统”代名词的新星。

不过,四大系统将来争夺的还是汽车、手机这两个最大的民用商业市场,没有人想错过即将出炉的这块大蛋糕。“我曾经想象,奥运会期间,每一个外国或者外地的来宾,一下飞机就能得到一个手持的导航仪。”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教授史其信在主持导航论坛的一个会议上,这样做开场白。导航产业中的从业人员却不会把这个情景仅仅当作想象,根据英国一项预测,到2012年,中国车载导航设备的年销售量将达到95万套,到2010年,中国的便携式自动导航系统(PND)销量将突破700万套。2006年,中国导航产业创造的产值是120多亿,2007年预计达到200亿。

几年前,一个重要人士预定给南卡罗来纳州一个院的全体学生发表演讲。整个礼堂都坐满了兴高采烈的学生,大家都对有机会聆听到这位大人物的演讲兴奋不已。

在州长经过简单介绍之后,演讲者走到麦克风前,眼光对着听众,由左向右扫视一遍,然后开口道:“我的生母是婊子,因此没有办法说话,我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也不知道

卫星导航系统是导航产业的基础,面对成长迅速的中国导航市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摩拳擦掌。但对于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来说,困难的是如何从GPS的手里抢夺市场。“GPS用了10年的时间来培育市场。”中国的卫星导航研究从1993年才起步,一共发展的时间也不过10多年。

让再承其和他的同事们倍感压力的是,如果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速度赶不上中国导航产业“爆发式”发展的速度,它将再次失去与其他3个导航系统竞争的机会。再承其认为,国家应该制定优惠政策,来鼓励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广泛应用。

**为什么要用**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为什么要建设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再承其提到了独立性的重要:“GPS没有承诺提供不间断的信号服务。”GPS还是一个以军用为主的卫星导航系统,

摘自《新民周刊》

## 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

他是否还在人间,我这辈子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棉花田去做事。”

台下的听众都呆住了。“如果情况不如意,我们总想想法加以改变。”

她继续说,“一个人的未来会怎么样,不是因为生下来的状况。”她轻轻地重复方才说过的,“如果情况不如意,我们总想想法加以改变。”

“一个人若想,改变眼前充满不幸或无法尽如人意的情况。”她以坚定的语气往下说,“只要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我希望情况变成什么样?’然后全身心投入,采取行动,朝理想目标前进即可。”

接着她的脸上绽现出美丽的笑容:“我的名字叫阿齐泰勒摩尔顿,今天我以美国财政部长的身份,站在这里。”

摘自《齐鲁晚报》

## 名流故事

## 毛泽东打麻将治肩周炎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日理万机,极少有时间娱乐。后来,他突然右肩疼痛,有时疼得不能握笔,不能睡觉,医生诊断为肩周炎。经过一段时间的医疗,毛泽东的肩周炎不仅不见好转,反而转为慢性。

当时卫生处领导着急,召集医务人员想办法,最后,领导交给朱仲

丽一个任务,说服毛泽东打麻将。

有一天,朱仲丽趁毛泽东心情好时,走进办公室,毛泽东叫她坐下。朱仲丽说:“不想陪我打麻将?”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你的嘴就是厉害。好嘛,医院开来处方一个,打麻将打四圈,目的是帮助肩关节的功能恢复。”

1967年夏天某个黄昏,戴安娜安静地坐在冰冷的台阶上,紧紧抓着锻铁雕花的楼梯扶手,看父亲把沉重的皮箱扔进汽车后备箱,穿棉布长裙的母亲,她脚下的漆皮高跟鞋在石子上路踢发出清脆的响声后,车门关上,她童年的所有美好快乐,就像气泡般,在母亲离开时的瞬间爆裂消散了。

戴安娜没有流泪,父母决定达成分居协议的这一年,她还只有6岁。被遣责、背叛和漠视的耻辱和伤心,让幼小的戴安娜没齿难忘。母亲离开后,父亲变得喜怒无常,她害怕又厌倦,就常常偷偷带着弟弟去郊外的桑君汉墓地。从未谋面的哥哥约翰,他刻着“爱心永志”的墓碑,似乎时刻在提醒戴安娜;对于斯宾塞家族,你这个女孩是多余的。如果你是一个男孩,母亲就不会弃你而去。

她用沉默的孤独,来回应父亲凶狠的凶狠,她故意穿得跟假小子似的,故意用泥巴把脸蛋涂得脏兮兮的在父亲身边招摇。但是每当家中来了客人,父亲就会吩咐保姆,为戴安娜穿上洁白的公主裙和红色小皮鞋,她不喜欢但是不反抗,还蹬着三轮车在过道上招摇。

1981年7月30日,丽霍斯特在报纸上看到了那个笑容倾城、美丽绝伦的戴安娜王妃。她依然还在汉普郡做保姆的她,一眼就认出了她的朋友。丽霍斯特泪流满面,她一点都不为戴安娜感到高兴骄傲。这个只会洗衣做饭的保姆,她根本就无法从王妃闪烁的眸子和珠宝里,看到她17岁那年的雀跃和快乐。

## 17岁的戴安娜

然后她是戴安娜16岁那年,她被姐姐带着去见了一个王子,那个王子叫查尔斯,当时是姐姐的男友。戴安娜将格子衬衫扎在灯芯绒长裤里,外面罩着姐姐的皮衣,足踏高跟鞋。她这个不三不四的样子把查尔斯逗得大笑不止。

那一次经历让本来就自卑内向的戴安娜很是懊恼羞愧,这可能也是一年后她坚持去汉普郡一个富人家做保姆的主要原因。她负责照看一个两岁大的孩子。同样在这家做保姆的荷兰姑娘玛丽恩·丽霍斯特,成了戴安娜一生中最为真诚朴实的朋友。她向丽霍斯特敞开心扉,两人像亲姐妹一样,相互关心,当然常常也背着主人说他们的坏话。

戴安娜跟丽霍斯特说她阴郁的童年,她的许多年不曾相见的母亲,她的10个月大就夭折的哥哥。她总是郁郁寡欢,但是当她和丽霍斯特提到16岁那年和查尔斯的见面时,

动关节的效果。因此,她常常坐在毛泽东的椅子上,故意出一些好牌让他“吃”,毛泽东连连“和牌”,气得叶子龙直瞪眼。

有一次,毛泽东和牌后笑着对大家说:“如果是开赌场,只要米仲丽坐在我的上家,我敢下注万万元,必成大富翁。你这个同志是不是在收买我,给我金钱炮弹,叫我当资本家呀?”满屋子的入顿时大笑不止。

摘自《老年文汇报》

1981年7月30日,丽霍斯特在报纸上看到了那个笑容倾城、美丽绝伦的戴安娜王妃。她依然还在汉普郡做保姆的她,一眼就认出了她的朋友。丽霍斯特泪流满面,她一点都不为戴安娜感到高兴骄傲。这个只会洗衣做饭的保姆,她根本就无法从王妃闪烁的眸子和珠宝里,看到她17岁那年的雀跃和快乐。

当这个万众敬仰的妃子为王室诞下两个男孩后,当她在法国著名的车祸中香销玉殒,当她离去整整10年后,举国上下依然都还在悲伤地悼念着她的今天,已经49岁,依然做着卑微的保姆的丽霍斯特总是会会说:“如果时间真能轮回到17岁,我想戴安娜更愿意做一个沉静的保姆,或者是一个雀跃的厨师。”

摘自《女报·时尚》

## “超级球迷”邓小平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个超级球迷,他曾经说过:“我生平最喜欢看足球。”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酷爱足球,足球场上经常闪动着他机警、灵活的身影。有一次,巴黎举行一场精彩的足球赛,邓小平十分希望能够观看这场比赛,却苦于手头没钱,深感懊丧。忽然,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对了,把衣服送到当铺换钱买票不就可以看上足球了吗?”想到这里,邓小平飞跑回寓所拿衣服当了钱,看了那场精彩的足球赛。几年之后,他还能回忆起那次比赛,记得谁是冠军。

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共产党人随时都有被敌人发现的危险,邓小平也没停止过看球。解放初期,邓小平任西南军区政委,他与司令员贺龙是一对超级球迷,老哥儿俩共同撮合了一件事。那时中国第一支国家队成立不久,他们把国家队请来与西南军区队比赛,一赛就是两场,政委与司令都从头看到尾。由于国家队优势大,西南军区队守门员曾雪麟多次救险,邓小平和贺龙频频鼓掌。在1959年全国足球联赛中,四川队风头强劲,球迷和报纸称赞:“成都白袍小将,不畏强手!”在北京与强敌“八一”队相遇,四川队勇敢顽强,以0比0逼平享有盛誉的“八一”队,对四川队深有感情的邓小平总书记和国家队委主任贺龙自始至终一直看完比赛。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三上三下的传奇经历中,有两次复出都是通过足球场发出了信号。这是邓小平与足球不解之缘的生动体现。1973年,经周恩来总理努力,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有人发现尚未安排工作的邓小平出现在先农坛体育场的主席台上看足球,人们知道小平离担任中央要职的时候不远了。1975年5月28日,已经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于繁忙工作间隙,前往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运动会足球比赛。1976年4月,邓小平又被“打倒”。“文革”结束后,1977年7月17日,北京举办了10个国家和地区12支球队参加的“长城杯”足球邀请赛,这是“文革”后我国首次举办的国际足球比赛。同一天,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7月30日晚,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主席台上,出席这次足球邀请赛的闭幕式,并观看中

国青年队同香港队的比赛,当播音员念到“出席这次比赛的首长有邓小平”时,全场掌声雷动。

邓小平爱足球绝对是一流。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比赛,有些场次没有转播,邓小平打电话给国家体委负责足球工作的黄中、陈家亮,叫他们把反映第十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纪录片《世界在你脚下》送到家中,他兴趣盎然地一气看了4个小时。1990年世界杯足球赛,中央电视台连实况录像一共转播了52场,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饶有兴致地看了50场。如果要在高龄老人中评出世界级的球迷,邓小平应该是当之无愧的!1994年美国世界杯,邓小平已经90岁了,中国都在深夜转播,他让工作人员录下比赛,白天再看。他特意嘱咐子女,不要告诉他比分,使他带着悬念看。

邓小平热爱足球运动,同时对足球运动员和发展足球事业也给予了很大关心。我国著名足球运动员张宏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全国无可争议的头号球星,他创造了很多个第一:1957年,打进了中国参加世界杯外围赛第一球;1958年,位列首次评选的“全国十佳足球运动员”之首;1962年被评为最佳足球射手。可惜的是,后来的伤病使张宏根不到30岁就挂靴退役了。20世纪70年代后他先后任中国青年队和国家队教练。他的伤病,一直挂在邓小平心上。1975年,邓小平去体委听取工作汇报,见到张宏根,他亲切地问:“张宏根,你的脚好了吗?”

邓小平酷爱足球,却对中国足球很少做具体指示,但短短几个字的足球要娃娃抓起”足以让足球界永远受益。1985年夏,距中国“五一九”失利不到三个月,国际足联创办的世界少年足球锦标赛在中国进行了首届赛事。8月上旬,邓小平请人带话给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先生:“我看了几场国际足联16岁以下阿达杯世界锦标赛的实况转播,看到各个队无论技术方面、体育道德方面都表现很好,他们踢得很有朝气,是世界足球运动的希望。中国少年队踢得也不错。我们中国足球运动要搞上去,就要从娃娃抓起。”国际足联把这次世界锦标赛安排在中国举办,这是对我们的鼓励和帮助,要感谢你们。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先生及其他领导人眼光看得远,从青少年抓起,举办这类的世界锦标赛,是个很好的创举。”8月11日

摘自《党史文苑》